1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

我们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跨入1979年。

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全体干部、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要动员起来，跟上客观形势的发展，在思想上来一个大解放。当前，摆在我们经济战线面前的任务，就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从第一天起就要抢时间，争速度，加快前进的步伐。

解放前，我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解放后我们用29年的时间，走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半个多世纪走过的路程。但是，由于我们的底子差，近十来年又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我国的工农业水平，同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对这种状况，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现在，我国的农业生产主要还是建立在手工操作的基础上，几亿人口搞饭吃，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1年生产的粮食，同美国比较，相差几十倍。我国钢铁工业的生产技术，一般还停留在50年代的水平。日本炼钢工人平均每人1年生产300吨钢，我们不过10吨左右。世界上一些国家的铁路，早已实现牵引电气化、内燃化，我国的蒸汽机车至今仍占机车总数的80%以上。在一些新兴工业部门，我们同人家的差距就更大。我国目前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多数领域大约相差15—20年。我们在赶超，人家也在前进。我们只有用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速度发展，才能实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宏伟目标。

在世界历史上，经济落后的国家赶上或超过经济发达的国家，是屡见不鲜的。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的上半期，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在经济上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到了19世纪末期，美国就超过了英国；20世纪初期，德国也赶上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日本，1950年的生产总值还大大低于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到了1968年，就超过了英、法和西德，仅次于美、苏，在经济上跃居世界第三位。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情，无产阶级更应该做到。

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幅度地提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为了加快现代化的步伐，就要大力采用先进技术，促使整个国民经济从落后的甚至是手工劳动的基础上，转到先进的、现代化的技术基础上。工矿企业中的党政工作，群众团体的工作，都要服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而不能离开这个中心。要免除对企业的“苛捐杂税”，积极创造条件，使企业领导干部至少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真正用来抓生产、技术、业务。为了加快现代化的步伐，就要从小生产式的甚至封建衙门式的落后的管理方法，转到符合现代化大生产要求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改变用单纯的行政办法管理经济的方式，充分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一切经济活动，都要努力做到以尽可能少的消耗取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果。要把企业经营的好坏同工人、技术人员、干部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使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个人和集体的劳动成果。为了加快现代化的步伐，就要通过世界性的经济技术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以检验和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和经济水平。要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基础上采取各种国际上通行而又对我们有利的方式，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尽量利用外国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

为了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我们必须结合经济工作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统一干部、群众的认识，克服各种思想障碍，使每个同志的思想和工作都适应这个转变。

要打掉精神枷锁，真正解放思想。毛泽东同志说：“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如果思想僵化，一切从本本出发，迷信盛行，我们就不能前进。我们要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就要有一批敢想、敢说、敢干、敢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落后的状况，怎么谈得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呢？各级党委和每个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敢想、敢说、敢干、敢于创新，都来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要破除迷信，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坚持反对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夜郎自大。只要有利于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管是哪国的好经验，我们都把它学过来。世界上没有一个现代化国家是闭关自守搞起来的。美国经济技术的强大，日本能够后来居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广泛采用世界各国的技术专长，把世界上主要的先进技术集中起来。那种拒绝和外国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做法，是作茧自缚、自我封锁，不是增强而是削弱自力更生的能力。我们不应该拒绝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现代化大生产的经验。列宁说：“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

要敢于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决裂。我国曾经是一个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既广又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大障碍。小生产习惯势力的一个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有些同志习惯于手工操作、手工业的管理方式，抵制、排斥使用新技术、新设备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有些同志喜欢搞小而全、大而全，不愿走专业化协作的道路，等等，都是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作祟，与现代化大生产是根本不相容的。我们必须善于学习先进，敢于打破落后的常规。

要克服官僚主义，打掉衙门作风。我们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有些人却沾染了不少官气。他们搞经济工作不按经济规律办事，而凭“长官意志”、行政手段发号施令。他们喜欢摆架子，讲排场，把自己领导的单位变成机构臃肿、层次重叠的官僚衙门。有些唾手可办的事情，得这个批示，那个圈阅，几个月定不下来。下级有事写报告请示，不答复；打电话找，秘书挡驾。他们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当官，以为掌管的摊子越大，指挥的人越多，官越大，政治、生活待遇也越高。同样的机器设备，在外国有工人和管理人员1000人就够了，我们这里常常超过人家三四倍，产量反而不如人家。为什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领导干部官气太重，管理混乱。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工会九大致辞中指出，今后各个企业的车间主任、工段长、班组长，要由本车间工段和班组的工人选举产生，某些严重失职或作风恶劣的领导人员和管理人员，职工代表大会有权向上级建议处分或撤职。这种做法对打掉官气，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定要有时间观念，反对拖拉作风。现在到十年规划的最后一年——1985年，只剩下7年了；到本世纪末，也只有22个年头。在7年、22年中，8亿人民将要创造出我们现在预料不到的奇迹。但是，如果我们不珍惜时间、不抓紧工作，还可能使我们同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得更长。时间是无情的。赢得了时间，就赢得了胜利；丧失了时间，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由于我们国家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那种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造成人们淡薄的时间观念。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弱点，一定要认真克服。

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说了就要做到。时间是紧迫的，1年、1月、1天、1小时都不能耽误。今年是建国30周年，我们一定要紧跟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战略部署，集中精力，争分夺秒，按日按月按季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建设计划，用优异的成就向三十大庆献礼！

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亲爱的台湾同胞：

今天是1979年元旦。我们代表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诸位同胞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祝贺。

昔人有言：“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欢度新年的时刻，我们更加想念自己的亲骨肉——台湾的父老兄弟姐妹。我们知道，你们也无限怀念祖国和大陆上的亲人。这种绵延了多少岁月的相互思念之情与日俱增。自从1949年台湾同祖国不幸分离以来，我们之间音讯不通，来往断绝，祖国不能统一，亲人无从团聚，民族、国家和人民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所有中国同胞以及全球华裔，无不盼望早日结束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

我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享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对世界文明和人类发展的卓越贡献，举世公认。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民族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尽管历史上有过多少次外族入侵和内部纷争，都不曾使我们的民族陷于长久分裂。近30年台湾同祖国的分离，是人为的，是违反我们民族的利益和愿望的，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每一个中国人，不论是生活在台湾的还是生活在大陆上的，都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繁荣负有不容推诿的责任。统一祖国这样一个关系全民族前途的重大任务，现在摆在我们大家的面前，谁也不能回避，谁也不应回避。如果我们还不尽快结束目前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我们何以告慰于列祖列宗？何以自解于子孙后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属黄帝子孙，谁愿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

近30年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已发生根本变化。我国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国际作用越来越重要。各国人民和政府为了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几乎莫不对我们寄予极大期望。每一个中国人都为祖国的日见强盛而感到自豪。我们如果尽快结束目前的分裂局面，把力量合到一起，则所能贡献于人类前途者，自更不可限量。早日实现祖国统一，不仅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的共同心愿，也是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共同希望。

今天，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世界上普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最近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实现，更可见潮流所至，实非任何人所得而阻止。目前祖国安定团结，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在大陆上的各族人民，正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而同心戮力。我们殷切期望台湾早日归回祖国，共同发展建国大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台湾各界人士也纷纷抒发怀乡思旧

之情，诉述“认同回归”之愿，提出种种建议，热烈盼望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时至今日，种种条件都对统一有利，可谓万事俱备，任何人都不应当拂逆民族的意志，违背历史的潮流。

我们寄希望于1700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台湾当局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我们一贯主张爱国一家。统一祖国，人人有责。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的贡献。

中国政府已经命令人民解放军从今天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台湾海峡目前仍然存在着双方的军事对峙，这只能制造人为的紧张。我们认为，首先应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之间的商谈结束这种军事对峙状态，以便为双方的任何一种范围的交往接触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环境。

由于长期隔绝，大陆和台湾的同胞互不了解，对于双方造成各种不便。远居海外的许多侨胞都能回国观光，与家人团聚。为什么近在咫尺的大陆和台湾的同胞却不能自由来往呢？我们认为这种藩篱没有理由继续存在。我们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信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摩。

台湾和祖国大陆，在经济上本来是一个整体。这些年来，经济联系不幸中断。现在，祖国的建设正在蓬勃发展，我们也希望台湾的经济日趋繁荣。我们相互之间完全应当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这是相互的需要，对任何一方都有利而无害。

亲爱的台湾同胞：

我们伟大祖国的美好前途，既属于我们，也属于你们。统一祖国，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时代在前进，形势在发展。我们早一天完成这一使命，就可以早一天共同创造我国空前未有的光辉灿烂的历史，而与各先进强国并驾齐驱，共谋世界的和平、繁荣和进步。让我们携起手来，为这一光荣目标共同奋斗！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电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祝贺中美两国建交

华盛顿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吉米·卡特阁下总统先生：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建交之际，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并通过向你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我认为，中美建交是两国关系中的历史性事件。它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将对国际形势产生有利的影响。我相信，它也必将为推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良好关系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华国锋

1979年1月1日

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下午举行的座谈讨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的大型座谈会上说，台湾归回祖国问题已提到日程上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告台湾同胞书》，体现了我们对台湾的归回和祖国统一的大政方针，基本立场、基本态度，但仍要做许多工作。

邓小平同志说，今天是1979年元旦，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说它不平凡，不同于过去的元旦，有3个特点：第一，今天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第二，今天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今天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因此，今天这个元旦是值得特别高兴的日子。这3个特点，反映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在国内工作和国际事务中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邓小平同志说，去年我国的生产形势很好，比我们原来预计的情况要好得多。这是与我们认真揭批林彪、“四人帮”，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分不开的。更值得高兴的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了举国上下心情舒畅、团结一致的局面。毛主席在1957年就提出的那种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去年逐渐地形成了。这个情况，特别集中地体现在我们党刚刚开过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种风气和局面概括起来就叫作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要把这种风气和局面在全国发扬下去、坚持下去、在党、政、军、民各方面发扬下去、坚持下去，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上搞得不好，民主少了一些，因此，我们更要发扬民主。

邓小平同志说，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集中反映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事情能提到具体日程上来，也是由于在国内和国际的工作中取得重大的成就的结果。在这个不平凡的日子里，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这3件大喜事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沉重的负担。从国内来说，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实现四个现代化不是十年八年的事，要到本世纪末，而且还要做很多工

作才能实现。有了好的国内和国际条件，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所以我们是有希望的。但要看到任务十分繁重。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认识，缺乏经验，需要好好学习，加倍努力。我们还要看到，有些事情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某些方面还会有困难。但是，只要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善于学习，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坚持民主集中制，我们的事业就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邓小平同志说，去年在国际事务中我们遵循的根本政策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制定的，但他们来不及实现就去世了。我们实现了他们遗愿的一部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国际反霸事业的发展，当前，和平的威胁来自北方，世界的不稳定和战争的根源也来自北方，如果说我们国家有外患的话，也是来自北方。大霸权主义、小霸权主义天天找我们的麻烦，有时甚至迫使我们采取一些我们不愿采取的步骤。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多，我们还要继续努力。我们要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巩固和扩大已经取得的大好局面。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委员对当前形势是高兴的和乐观的，也是乐意作出自己的贡献的。

出席今天座谈会的有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部分人大常委和民主党派负责人：万毅、王甫、王雪莹、王维纲、方仲如、孔原、孔从洲、甘祠森、古耕虞、申健、叶道英、包尔汉、刘晓、刘鼎、刘仲容、刘景范、关瑞梧、安士伟、许立群、孙毅、孙承佩、孙起孟、孙晓村、严信民、苏子蘅、李信、李琦、李力殷、李文宜、李世济、李步新、李纯青、李卓然、李金德、杨士杰、杨东生、杨秋玲、吴文俊、吴茂荪、吴亮平、吴觉农、吴雪之、何长工、谷春帆、汪德昭、宋希濂、张苏、张策、张邦英、张孝骞、张克侠、张含英、张南生、张维桢、张瑞华、陈正湘、陈维稷、陈锐霆、林修德、罗琼、金城、周士观、郑洞国、屈武、赵朴初、胡子婴、钟师统、钟惠澜、侯祥麟、侯镜如、俞大绂、闻家驷、姜椿芳、费孝通、夏之栩、顿星云、钱昌照、徐伯昕、徐彬如、徐楚波、郭影秋、黄维、黄甘英、曹广化、阎揆要、韩光、程思远、童小鹏、曾传六、曾涌泉、雷洁琼、熊天荆、熊向晖、潘菽、蹇先任、贝时璋、朱学范、华罗庚、陈逸松、茅以升、赵忠尧、周培源、葛志成、伍禅、田富达、徐萌山。

出席座谈会的有关方面负责人还有：李贵、彭友今、聂真、杨思德、李霄路、秦德远、王涛江、周而复、平杰三、薛子正、张执一、王克俊。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北京出席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伍德科克主任的招待会

邓小平副总理今天在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和夫人为中美建交举行的招待会上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建交对于发展中美两国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深远影响，必将会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

邓小平副总理在招待会上祝酒，他说，1979年元旦，对中美两国人民来说，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从这一天起，中美两国关系长期不正常的状态结束了，两国人民热切期望的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

他指出，“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是两国关系中的历史性事件，也是国际生活中有着深远影响的大事。卡特总统在宣布中美建交消息时说，美国并不是出于暂时的策略上的原因或权宜之计而采取这个重要步骤的。我赞赏这个富有远见的见解。中国政府一向是从长远的政治和战略观点来看待中美关系的”。

邓小平副总理接着说：“不久以后，我将应卡特总统的邀请，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我希望通过与美国领导人和美国人民的直接接触和会谈，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以及两国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等多种领域的友好联系与合作。”

在庆祝中美建交的时候，我们深切怀念生前为打开中美关系开辟了道路的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人们也自然会忆及尼克松总统、福特总统、基辛格博士、美国参众两院的许多议员先生和各界朋友多年来为促进中美关系作出的努力。对于这次中美两国最终实现关系正常化，卡特总统、布热津斯基博士和万斯国务卿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对此，我们给予高度的评价。

伍德科克主任、他的前任和他的同事们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以及促进中美建交作出了积极努力，我们对此表示感谢。

最后，我愿借此机会对远道前来访问的美国众议院和新闻界的朋友们表示欢迎。

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团长、民主党众议员托马斯·路·阿什利在祝酒时说，卡特总统要他向邓副总理转达“他的非常愉快和满意的心情”。他说：“卡特总统认为，在元旦佳节，中美两国采取的步骤，是通向友谊、和平与合作的重大步骤。”

阿什利先生说：“我们今晚参加的这个庆典，表明美国政府和议会、美国人民一致赞同和伟大的中国人民发展友谊。”

他说：“今后，美国国会有特殊的责任保证中美重建的友谊毫无阻碍地向前发展。在这方面，你们可以信赖我们会作出努力的。”伍德科克主任在招待会上祝酒，他说：“今天，1979年1月1日，是中美两国人民关系中有历史意义的一天。联合公报今天开始生效，这就结束了近30年来两国政府之间没有正式外交关

系的状况。我们两国之间过去联系的中断，损坏了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长期的友好传统和互利合作，并对世界和平事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我们今天采取的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步骤，用卡特总统的话来说，能有利于当今的世界和今后的世界。”

他说，新年的第一天是展望未来的日子。中美两国人民都具有充满创造力，并且尊重勤劳和艰苦工作这样的传统。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之间建立关系的新时代的开始，将对两国和全世界的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他说：“我们特别高兴的是，邓小平副总理将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卡特总统和美国人民期待着邓副总理对我国的访问。”

应邀出席招待会的中国各界客人约 200 人，他们中有邓副总理的夫人卓琳，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和夫人殷森，外交部部长黄华、外贸部部长李强，化工部部长孙敬文，文化部部长黄镇，教育部部长刘西尧，新华社社长曾涛，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沈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王冶秋、贝时璋，以及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财政部确定进一步减轻农村税收负担并规定实施办法

实施办法已经国务院批准。预计全国农村每年将因而增加收入 10 亿元以上。

新的减税办法规定，从今年开始，农村社队企业工商所得税的征收起点，将由原来的 600 元提高为 3000 元，在起征点以下的一律免税，税率仍按 20% 的比例征收。新办的社队企业开办初期纳税有困难的，原规定除生产烟、酒、棉纱等高税率产品的外，可免征工商税、所得税 1 年至 2 年，现在规定可免征 2 年至 3 年。边境县和民族自治区（旗）的社队企业，免征工商所得税 5 年。目前经济条件仍然很困难的革命老根据地（如陕北等地），需要对社队企业免征工商所得税的，可由各省、自治区报国务院批准实行。为了总结经验，少数省对社队企业所得税试行 4 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的，仍继续试行，起征点也改为 3000 元。

在农业税方面，凡属粮食产区低产缺粮的生产队，每人平均口粮在起征点以下的，免征农业税。各地农业税的起征点，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原则，按照国家确定的口粮标准及有关要求作出规定，报国务院审批。对于经济作物产区、城市郊区的生产队，凡是收入较高、口粮由国家供应、过去农业税一般征收代金或经济作物的，今后要继续征收。

我国农村的税收负担一向比较轻，1977 年在农村征收的工商税、工商所得税、农业税 3 项税收额仅占农村工农业总产值的 3.35%。新的减免措施实施后，农村税收负担将进一步减轻，这对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改善农民生活，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交通部决定全国公路交通监理人员穿 用统一式样的服装 帽徽 臂章和监理证

从 1979 年 1 月起，全国公路交通监理人员一律穿统一式样的服装，佩戴帽徽和臂章，持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监理证”。

公路交通监理人员的服装式样，除男式单帽为大檐帽外，其余均为人民解放军干部服式样，颜色为深灰色，纽扣上有“公”字组成的方向盘图案。帽徽为国徽图案。臂章为菱形，上有“交通监理”字样。

交通部决定全国公路交通监理人员穿、用统一式样的服装、帽徽、臂章和监理证，是为了加强法制、更好地执行交通法令、指挥交通，维持秩序，严肃处理违章事件，确保公路畅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着装前，交通部发出通知，要求交通监理人员模范遵守党纪国法，努力工作，认真负责，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在华盛顿举行升旗仪式

中国驻美联络处 1 月 1 日清晨举行隆重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建交生效日。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 7 时半迎着晨风冉冉升起时，中国驻美联络处官员、中国血统的美籍学者和华侨代表一片欢腾。

华盛顿地区的中国血统的美籍学者任之恭、张捷迁、吴京生等和爱国华侨代表，1 日清晨就赶到中国驻美联络处，热烈祝贺中美正式建交并参加了联络处的升旗式，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副主任韩叙亲切会见了他们，同客人们相互祝贺新年和中美建交。

在此以前，台湾当局在华盛顿的“大使馆官邸”的旗帜已经在 1978 年 12 月 31 日降下。同时，台湾当局在美国 14 个城市的“领事馆”也关闭。

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在华盛顿举行招待会庆祝中美建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柴泽民、副主任韩叙在华盛顿举行招待会，庆祝中美建交。

出席招待会的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在祝酒时说：“今天确实标志着中美关系中一个新的内容丰富的时代的开始，标志着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稳定的时代的开始，标志着我们两国人民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稳定的世界作出建设性贡献的开始。”

蒙代尔副总统是代表卡特总统和美国政府出席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次招待会的。他说:“持续得太久的不正常状态结束了,上海公报所规定的前景实现了,我们两个伟大的民族和好了,我们可以高兴地进行一向期望的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发展友谊,扩大商业、旅游和文化学术交流了。”

蒙代尔说,中国人和美国人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的文化,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也不同。但是,他说,“使我们走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在创造一个经济发展、稳定与和平的世界这一方面,我们之间有着并行不悖的利益”。

柴泽民主任在招待会上祝酒时说:“今年元旦,不仅是人们的传统节日,而且是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的大喜日子。它对中美两国人民具有特殊的意义。”

他说:“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两国领导人、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制定了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战略性政策,并为此做了不懈的努力。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双方发表了上海公报,开始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卡特总统就任后,一再宣称,根据上海公报精神,实现关系正常化是美国政府的目标。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这一目标终于实现了。卡特总统、布热津斯基博士和万斯国务卿为此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我们十分赞赏。”

他指出:“中美建交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愿望和利益,而且必将对反对霸权主义的扩张和侵略、维护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起积极的作用。”

柴泽民说:“应卡特总统的邀请,邓小平副总理将于1979年1月正式访问美国,这是我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这将是又一个重要的国际性政治行动。”

出席招待会的将近600人中包括美国国务卿万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卡利法诺,运输部部长亚当斯,总统科学技术顾问普雷斯,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纽瑟姆,负责安全援助、科学技术的副国务卿本森以及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

美国全国科学院院长汉德勒,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理事长菲利普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约斯特,著名学者杨振宁、丁肇中、任之恭、张捷迁、林家翘、牛满江和缪云台等也出席了招待会。

对外友协会会长王炳南在北京举行宴会欢迎孟加拉国—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米尔扎·吴拉姆·哈菲兹率领的孟中友协代表团

哈菲兹先生是我国人民的老朋友。多年来,他克服种种困难,致力于孟中友好事业。他曾在孟加拉国建国后第一个率领代表团来华访问。哈菲兹先生现在任孟加拉国政府内阁成员、土地管理和土改部长。昨天,哈菲兹先生又率领代表团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使中国主人感到非常高兴。王炳南会长在祝酒时热情赞扬哈菲兹先生和孟中友协的其他朋友为增进中孟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所作出的贡献。哈菲兹先生在致答词时指出,孟中友协将继续高举孟中友好的旗帜,孟中友好决不会受变化不定的国际局势的影响。

宴会上,中孟两国朋友还互贺新年。

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发表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已经宣布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中美建交将有助于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为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

台湾是我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为了方便台、澎、金、马的军民同胞来往大陆省亲会友,参观访问和在台湾海峡航行、生产等活动,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从今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

台湾归回祖国,完成国家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爱国一家。我们相信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包括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必将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更大的努力。台湾终究要回到祖国的怀抱,台湾同胞和祖国亲人团聚的心愿一定会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 徐向前

1979年1月1日

《民间文学》杂志复刊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的《民间文学》杂志,创刊于1955年。它对于开展全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起过积极的作用。

复刊第1期刊登了周扬同志即将出版的《中国歌谣选》作的序,肖华同志关于大力提倡民歌的文章,还有民间传说《陈毅同志的故事》,关于王羲之、郑板桥的传说,哈萨克族寓言和抨击“四人帮”的政治笑话等。

1月2日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民主党众议员托马斯·路·阿什利率领的美国众议院银行 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

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后首批来华访问的美国朋友。

邓小平副总理在回答美国朋友提出的有关台湾前途的问题时说，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是采取现实态度的。1月1日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是真诚的，是合情合理的。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美国朋友时指出，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对亚洲、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他希望在中美建交后有更多的美国朋友来中国访问，以增进相互了解。

阿什利团长说，在美国人的眼光中，中国是举足轻重的国家。我们两国有许多共同处，有许多领域可以进行合作。今后，中美两国间的合作具有广阔的前景。

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旅行游览事业总局局长卢绪章，农林部副部长何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李川，中国银行副总经理林基鑫，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朱启祯等。

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在文联举行的迎新茶话会上对文艺界提出希望

胡耀邦同志说："我们伟大祖国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时代列车，现在已经开动了！党的三中全会公报，就是这列列车启动的汽笛声。""在这个列车启动的关键时刻，请同志们尽情地大胆地唱出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最强劲的进行曲，请同志们用你们手里的琴弦拨出时代的最强音！"

茶话会在新侨饭店礼堂举行，文联筹备组组长林默涵宣布茶话会开始，近300名文艺界人士报以热烈的掌声。

文化部部长黄镇同志在迎新会上作了讲话。他说，随着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我们文学艺术工作也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首先要从思想上来一个大转变。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要投入到这一场大革命洪流中去，研究新问题，熟悉新事物，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敢于冲破各种禁区，破除迷信，不断创新，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政治局面，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

他着重指出，必须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展文艺的方针。我们贯彻执行"双百"的方针，重点在放，只能放，不能收。"双百"方针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文学艺术方面的生动体现。群众路线的方法，也就是民主的方法。由于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认真执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甚至像林彪、"四人帮"这样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把民主扼杀了！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党的统一领导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文艺要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文学艺术作品的好坏，是否为人民所喜见乐闻，不是哪个领导批准可以算数的。要倾听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当然，来自群众的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但也有错误的，这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进行讨论。我们要坚决贯彻"三不"主义。如果作品有政治错误，违反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标准，我们要发言提意见，但也不能轻率做结论。

他说，过去一年，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创作了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但文化部和文学艺术界是重灾区，落实党的政策还要进一步加快步伐，要把一切冤案、错案、假案，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尽快解决。文化部和文学艺术界在"文化大革命"前17年工作中，虽然在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过程中，犯过这样和那样的"左"的和右的错误，但根本不存在"文艺黑线专政"，也没有形成一条什么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林彪、"四人帮"强加的诬陷不实之词，应该彻底推倒，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文学艺术大军和全国人民一道，雄赳赳地迈上新长征的道路，在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中，用我们辛勤的劳动创作更多、更好的文学艺术作品，来纪念新中国成立30周年，祝文学艺术界在新的一年里获得比过去一年更大的成绩。

胡耀邦同志在讲话中表示完全赞成黄镇同志的讲话。他说，要把我们国家四个现代化的列车开动起来，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生前的愿望。但是，20多年来，由于我们工作上的失误，主要的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这列列车没有很快地前进。这2年多，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激烈的战斗，把这列列车的火车头修好了，各种路障排除了，燃料加足了。同志们是人民的歌手。今天我们聚会，希望同志们想想：在我们这列奔向四个现代化的列车上装的是什么？装的是我们整个党、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的希望、心愿、欢乐和幸福！在这列列车开动的时候，我们人民的歌手能不供给他们最好的精神食粮吗？我们过去没有这个条件。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和文艺界的关系彻底破坏了。林彪、"四人帮"搞了一个反革命的宣传部门，把全国的文艺界办成一个管教所。在这个罪恶的管教所里，他们设置了数不清的清规戒律，他们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我们要砸烂这个管教所，要建立新的，也就是恢复毛主席创立的党和文艺界的关系。这个新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党的宣传部门应该是文艺界同志们前进过程中的"服务站"。这个"服务站"如何服务好？这还要你们文艺界的同志们多作建议。我想到的，这个"服务站"大概要有这几个部

门：一个是文艺“问讯处”——指出文艺的方针、路线，给文艺创作以指南；一个是“资料室”——为文艺创作提供过去的和现在的资料；一个是休息室——歌手们口渴了，有一口凉白开喝；一个是还要有个“医疗室”。假使我们的文艺发生了感冒，嗓子哑了，总要搞些清凉剂；一个是还得有个“修理室”。歌手们的乐器坏了，总得需要修理修理。这后两个就是同志们讲的文艺评论和批评。这两个我们不懂，请一些专家和人民群众来做，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来帮助我们的百花开得更鲜艳。有了这一些，我相信，在我们这列时代列车坚定不移的前进中，我们文艺界的同志是一定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

著名的相声艺术表演家侯宝林即席赋诗。他说，我一向是说相声的，是搞散文的。今天听了胡耀邦、黄镇同志的讲话，心里非常高兴。四个现代化伟大建设开始了，党的宣传部要做我们的“服务站”了，我诗兴大发，诌了4句五言诗：“春天又来到，鲜花需水浇。既要施肥料，也要施农药。”可是，过去“四人帮”是怎么干的呢？是：“掘之以锹，沸水大浇，枝叶尽凋，最后全烧！”他的话引起了全场会意的畅笑声。茶话会上始终洋溢着热烈的节日气氛。人民歌唱家张权、马玉涛，著名京剧演员李世济、李和曾等都作了精彩演唱。

出席茶话会的文艺界著名人士有：于兰、艾青、叶君健、江丰、刘开渠、李波、李伟、李凌、李苦禅、李伯钊、李春光、沙汀、吴雪、吴作人、吴伯箫、吴晓邦、冯乃超、吕厚民、时乐蒙、阿甲、金山、陈登科、邵宇、严文井、杨荫浏、张汀、张庚、张修竹、草明、赵朴初、姚雪垠、钟敬文、徐平羽、徐肖冰、陶钝、黄佐临、黄永玉、钱俊瑞、谢冰心、喻宜萱、雷圭元、蔡若虹、魏伯、魏巍、魏传统、戴爱莲等；还有文艺、宣传部门的负责人朱穆之、胡绩伟、曾涛、刘复之、周巍峙、阳翰笙、张光年、贺敬之、刘白羽、王阑西、姚仲明、司徒慧敏、周而复、吕骥、王惠德、王子野等。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和气魄》

目前，许多地区和部门在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的工作中，思想解放，态度坚决，措施得力，行动迅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实践证明，党中央的这一决定，对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做好安置工作，对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为右派的人做好改正工作，是非常正确的，是大得人心的。

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对于确属错划为右派的人，尽管事隔多年，也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这完全符合党的原则，符合党的政策。现在我们处理这个问题，仍应以1957年10月15日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为依据。凡符合划右派标准定为右派的人，是摘帽子的问题，不是改正的问题。凡确实被错划了的，则是改正的问题，不是摘帽子的问题。划错了多少，就改正多少，决不应划框框、定调子和按什么比例。即使本人没有提出申诉或本人已经去世，也要按照规定标准，认真复审他当时被划为右派的事实材料，如属错划的，也应予以改正。某些疑难案件，应对本人进行历史的全面的综合的考察，要根据他在革命斗争中的一贯表现，来判断他是否在根本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经复查、批准予以改正的人，要恢复政治名誉。原是共产党员的，如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应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撤销开除团籍的处分。对已经改正的同志，要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级别。

这样做，会不会否定反右派斗争呢？肯定地说，不会。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历史已经作出结论。这是不容否定也否定不了的。但是，事物是发展的。当时右派向我们进攻，鼓吹“轮流坐庄”，叫嚷“杀共产党”，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及时对它们进行反击，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给那些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戴上右派帽子，是为了教育改造他们。经过教育改造，他们转变了，就应该根据今天的情况，给他们摘掉帽子。当初必须“戴”，不“戴”就不能有效地教育改造他们；今天必须“摘”，不“摘”就不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这种“戴”和“摘”，是符合毛主席制定的要给出路的政策的。至于对被错划为右派的人进行改正工作，更是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大事。当时一些地方和部门错划了一些右派分子，伤害了不少好同志，这是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决不能让错误的东西继续保存下去。见错不纠，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纠正了错误的方面，就会使正确的方面发扬光大。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进行改正，正是为了保卫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成果，维护毛主席的路线和政策，这怎么能说是否定反右派斗争呢！

共产党人是靠实事求是吃饭的，我们应当有敢于坚持真理，敢于修正错误的无产阶级气魄。这些年，林彪、“四人帮”大搞假左真右，把人们的思想和是非界限搞乱了，他们的帽子、棍子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许多冤案错案得不到昭雪，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自然也无法申诉多年的冤屈。今天，党中央作出了英明决定，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理应抱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认真做好这项工作。如果认为“过去的问题过去算了，只要摘掉帽子，安排工作，就行了”，这不是郑重的态度，是对革命同志政治上的不负责任，也有负于党和人民的委托。过去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已经改正

的同志，应当顾全大局，珍惜当前大好形势，团结起来向前看，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奋发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

党中央对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作出的英明决定，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做好这项工作，对于维护毛主席的路线和政策，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恢复和健全正常的民主生活，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及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等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央党校、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的改正工作所以进度较快，是由于他们对这项工作有正确认识，有较强的党性和政策观点，对那些负屈20多年的同志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但有些地区的有关部门，面对这项重要工作，犹犹豫豫，摇摇晃晃，至今不敢切实地抓起来。这样的精神状态同当前的大好形势是不适应的。要办的事情很多，一定要珍惜每一个人力、每一分时间，尽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项工作做好，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上去。

中央一些部门改正一批错划右派

《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属一些部门，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积极慎重地做好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做好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人的改正工作。这对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作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具有重要意义。

中央的决定下达后，不少单位对这项工作抓得较紧，进展较快，已正式公布了第一批改正的名单。据了解，中央党校原划右派分子98人，经过初步复查，确定王谭等39人属错划，应予改正。最高人民法院原划右派分子56人（包括由他们复审的原司法部、政法学会、法律出版社等单位），经过复查，初步确定贾潜、林亨元、朱耀堂等12位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应予改正。公安部原划右派分子63名，经过复查，确定有60人是错划的，应予改正。外贸部原划右派分子193人，经过初步复查，确定有104人是错划的，应予改正。人民日报社原划右派分子30名，经过复查，初步确定黄操良、蒋元椿、刘衡等10位同志是错划的，应予改正。凡是应予改正的，经过党支部讨论通过，报上级党委或党组批准，均已恢复组织生活和原来的工资级别，另行安排适当工作。现在这些单位的复查改正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不受比例限制，错多少，改正多少，力争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全部妥善地完成这项工作。

复查、改正的情况表明：这些年来，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虽然开除了党籍，降职降薪，但他们中的多数仍然相信群众相信党，仍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持为人民服务。经过改正，这些同志和他们的家属都感谢党给了他们第二次政治生命。他们表示：今后在新的长征中，一定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的努力，为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中国对外关系迅速发展

《人民日报》报道：目前与我国有外交关系的共有117个国家，这117个国家按地区分布来说，亚洲28个，非洲43个，拉丁美洲12个，欧洲27个，北美洲2个，大洋洲5个。截至1978年9月底，我国已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包括同70多个国家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签订了政府间的贸易协定或议定书。

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谴责史密斯反动当局侵犯前线国家

全文如下：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罗得西亚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接二连三地悍然出动飞机和军队，对莫桑比克、赞比亚和博茨瓦纳进行疯狂的武装袭击和入侵。1978年11月底至12月初，史密斯反动当局的飞机多次袭击莫桑比克的加扎、太特和苏发拉等省的一些地区，残酷杀害莫桑比克无辜居民和津巴布韦难民；12月20日，它继10月至11月间多次袭击赞比亚之后，又再次派机入侵赞比亚国境，进行野蛮的轰炸和扫射，造成赞比亚和平居民和津巴布韦难民的伤亡。在此期间，它还一再入侵博茨瓦纳领土，给博茨瓦纳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损失。这是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对津巴布韦人民，对莫桑比克、赞比亚、博茨瓦纳人民以及整个非洲人民犯下的新的血腥罪行，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强烈的谴责。

近年来，史密斯反动当局在津巴布韦人民武装斗争的沉重打击下，内外交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它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在帝国主义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纵容和支持下，一手策划“内部解决”的政治骗局，一手加强武装镇压，妄图扑灭津巴布韦人民武装斗争的烈火，迫使前线国家放弃支持津巴布韦人民斗争的立场。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它的倒行逆施既压不垮英雄的津巴布韦人民，也吓不倒主持正义的前线国家，只能更激起津巴布韦人民和非洲人民同仇敌忾和更加强烈的斗争，从而加速它自己末日的到来。

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津巴布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莫桑比克、赞比亚、博茨瓦纳等前线国家反击史密斯反动当局武装挑衅和侵略的正义斗争，并且相信，津巴布韦人民只要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排除一切外来干涉，在前线国家、广大非洲国

家以及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一定会取得民族解放斗争的完全胜利。

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在延安正式开放

1月3日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北京会见由孟中友协主席米尔扎·吴拉姆·哈菲兹率领的孟中友协代表团

华国锋总理说，中孟两国的关系发展得很好，孟中友协对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赞扬孟加拉国人民的齐亚·拉赫曼总统领导下，在国内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他说：我们很希望孟加拉国繁荣昌盛起来。我相信，孟国拉国人民也同样希望我们繁荣昌盛起来。

哈菲兹先生指出，孟中之间有很悠久的友谊，我们的友谊是经过时间考验的。会见时，哈菲兹先生向华国锋总理转交了齐亚·拉赫曼总统的信。华国锋总理请哈菲兹先生回国后，转达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和他本人向齐亚·拉赫曼总统以及孟加拉国政府和人民表示的良好祝愿。华国锋总理说，他衷心祝愿孟加拉国人民在新的一年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孟加拉国驻中国大使莫明参加了会见。会见时，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和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在座。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扬民主和实现四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努力健全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这对于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对于顺利地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加速现代化建设步伐，有着重要的意义。

现在，我们党和国家正处在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的极其壮丽、极其艰巨的事业。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这个宏伟任务，要求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全体党员、全国人民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要求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贡献出一切聪明才智；要求亿万人民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革命精神，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进行批评；要求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群策群力，鼓足干劲，全力以赴。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在我们党和国家的生活中充分发扬民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广开才路，发现大批能干的人才；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十分明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离不开社会主义民主的大发扬。四个现代化，必须伴随着政治上的民主化。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大发展的上层建筑，就要坚决改掉那些不利于发扬民主、不利于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作风以及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章制度。

十分令人鼓舞的是，这次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充分讨论，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从而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作出了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许多重要决定，提出了加快实现现代化的许多切实可行的办法和建议。这两个会议集中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心愿，理所当然地赢得了3000多万名党员和8亿人民的衷心拥护，必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这两个会议所表现的民主精神，是我们党很多年来没有过的，确实是伟大历史转折关头的一个很好的开端。我们一定要像三中全会要求的那样，把这种民主作风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一个现代化的企业，没有集中统一的指挥、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生产。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搞四个现代化，没有集中统一的坚强领导，更是不可设想的。但是，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民主集中制，既要民主，又要集中，而它的基础是民主。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丢掉无产阶级的民主，就形不成无产阶级的集中。离开民主，不让人讲话，不走群众路线，搞一言堂，瞎指挥，凭"长官意志"办事，实行命令主义，如此等等，决不是真正的集中、正确的集中。这样的集中丝毫不能推进现代化建设，恰恰相反，只能给现代化建设带来危害。当前这个时期我们所以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就是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林彪、"四人帮"为什么能长期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横行于党纪国法之外？为什么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他们的倒行逆施只能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而不能实行监督和制裁？为什么许许多多老干部能够对付拿枪的敌人，却被这几个丑类恣意迫害而无可奈何？最根本的教训，就是他们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缺乏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不充分发扬

民主，不只是现代化建设无法顺利进行，也不可能及时揭露和清除像林彪、“四人帮”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无产阶级专政就不会巩固，党和国家就要改变颜色。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这里用得着列宁的一句话：“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

安定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在两年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我们要十分珍惜这种局面，努力巩固和发展这种局面。为了安定团结要不要强调发扬民主？发扬民主会不会影响安定团结呢？我们认为，安定团结和发扬民主并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只有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才能实现安定团结。万马齐喑不是安定团结。毛泽东同志曾经引用清人龚自珍的诗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万马齐喑是封建专制造成的一种可悲局面，那是一潭死水，当然谈不到什么安定团结。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也造成了万马齐喑，当然更没有安定团结。有了党内外正常的民主生活，有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心情舒畅，有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才有真正的安定团结。大家知道，林彪、“四人帮”是破坏安定团结的祸根，这个祸根已经挖掉了。当然，也还会有极少数“震派”人物兴风作浪，需要保持警惕。当前妨碍安定团结的，主要是人民内部由于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以及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造成的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例如，干部政策、经济政策和其他方面的政策没有完全落实；某些冤案、错案、假案没有平反昭雪；一些干部思想不解放，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作风没有根本转变；群众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方面一些合理的要求没有得到适当满足，等等。这些问题解决得好，有利于安定团结；解决得不好，就不利于安定团结。而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很重要的一条是发扬民主，让人说话，让人批评，有气的还要让人出气。作为领导，要认真倾听群众呼声，采纳他们的合理意见和要求，切切实实改进工作。这样才能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才能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

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深入开展，特别是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广大群众精神振奋，思想活跃，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人们对党和国家大事敢于发表意见，提出各种批评和建议，这是人民群众政治积极性高涨的表现，是我们国家民主生活走向正常的表现，是好事，不是坏事。有些同志嘴上也讲要发扬民主，但当群众发表了一点不同意见，他们就忧心忡忡，担心出“乱子”，像“叶公好龙”那样害怕起来。这些同志不懂得什么叫民主集中制，以为讲民主就是我给你民主，我让你讲话，你讲话可不能超出我喜欢听的范围。他们不了解群众中本来就有不同的意见，发扬民主就是要让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只有群众把各种意见都讲出来了，领导才有可能进行正确的集中。如果只准大家按领导规定的口径唱一个调子，那又何必多此一举，走“民主”的形式？须知，对于执政的革命党来说，有不同的意见并不可怕，反而大有好处，真正可怕的倒是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人民敢于讲话，允许人民讲话，是我们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害怕人民讲话，实际是软弱和神经衰弱的表现。

当然，群众发表的意见并不都是正确的，提出的要求和主张也不都是恰当的。少数人会发表一些片面、偏激甚至错误的意见。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没有什么可怕。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如果要求人们不说一点错话，那就等于封人家的口。如果人们说了错话就要追究，那就没有人敢再讲话了。这叫作因噎废食，因小失大——废掉了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失掉了生动活泼的局面，其后果将是很严重的。我们应当坚决摒弃这种有害的做法。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决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无数事实证明，压制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要坚决保护。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倡的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应当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不折不扣地付诸实行。“三不主义”也就是“言者无罪”，实行这一条，才能使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对于人民群众中不正确的意见怎么办？要善于引导。有些问题，群众不了解情况，就要加以解释。有些问题，条件还不成熟，不能立即解决，就要给以说明。有些问题，群众只看到局部，就要晓以小局服从大局的道理。至于有个别坏人心怀不满，别有用心，那也无碍大局，应该相信，广大群众是能够识别出来的。总之，我们要造成一种空气，使广大群众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问题；又要多做工作，把不正确的意见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把群众的革命热情引导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我国是一个封建主义统治了2000多年的国家，近代又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本来缺乏民主传统。林彪、“四人帮”大搞法西斯专制主义，又把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民主作风破坏殆尽。粉碎“四人帮”以后，民主作风得到恢复和发扬，但是如何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就不能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我们要在发扬民主的实践中学会民主。要使人民群众充分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在各个领域造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讨论问题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空气，从上到下养成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习惯。要善于把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恰当地结合起来。我们这样做了，必将进一步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离开北京前往非洲4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在北京会见美国众议员伯克利·比德尔和夫人及其家属

中国1978年向28国派出490多名出国留学人员

新华社报道：1978年我国通过多种渠道，向全世界28个国家派遣了490多名出国留学人员，这是近十几年来，我国出国留学人数最多的一年。派出留学人员的28个国家是：比利时、孟加拉国、加拿大、丹麦、埃及、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印度、伊朗、伊拉克、意大利、日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老挝、马耳他、墨西哥、新西兰、巴基斯坦、波兰、罗马尼亚、斯里兰卡、苏丹、瑞士、叙利亚、英国、美国、南斯拉夫。

派出留学人员中有副研究员、讲师、工程师、主治大夫、高等院校肄业生、高中毕业生、国务院各部委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和在职翻译等。年龄从20岁到45岁不等。他们当中有的是学习理工农医专业，有的是学习英、法、德、日、西班牙、阿拉伯等语言专业，有的是学习经济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专业；有的是到国外大学深造提高，有的是在国外有关学科的研究所、研究中心学习研究。留学时间是2年到3年。

1月4日

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

《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所谓“一月革命”，是指张春桥、姚文元1967年1月4日到2月5日建立“上海人民公社”这一段时间内进行全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是林彪、“四人帮”搞乱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它的矛头针对各级领导干部，是向党中央夺权。

《报告》提出，对在“一月革命”中被公开点名批判的陈丕显、曹狄秋、魏文伯、杨西光等人，所有受迫害的赤卫队等群众组织和干部、群众，以及一切假案、错案、冤案，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予以统统推到。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于1月4日至22日举行。遵照党中央的规定，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党规党法，保护党员的权利，发挥党员的革命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同一切违反党纪、破坏党的优良传统的不良倾向作斗争，切实搞好党风。会议着重研究了维护党规党法，搞好党风的问题，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一系列准则，讨论和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以及关于如何做好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告》。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同志主持了会议，并讲了话。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等同志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

会议结束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王鹤寿同志作了总结讲话。

到会的委员共97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列席了会议。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布第一次全会通告

全会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

全会认为，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全党自上而下地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健全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对于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变，保证四个现代化的顺利进行，都具有重大意义。

号召全党从事纪律检查工作的同志，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既要坚持党的原则，以大无畏的精神去克服各种困难，又要保持谦虚谨慎、冷静客观、兢兢业业的态度，力戒骄傲自满、主观武断、粗枝大叶的作风。

（一）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于1979年1月4日至22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97人出席了会议。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同志主持了会议，并讲了话。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等同志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

这次全会，认真学习和讨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的公报和重要文件，一致同意三中全会确定的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面来的战略决策及各项决议，一致拥护三中全会关于把发扬党内民主、坚持实事求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的决定。参加全会的同志以极大的义愤，揭发和批判了林彪、“四人帮”一伙肆意践踏党内民主和党规党法、疯狂破坏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严重罪行。

全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

遵照党中央的规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党规党法，保护党员的权利，发挥党员的革命热情和工作积极性，同一切违反党纪、破坏党的优良传统的不良倾向作斗争，协助各级党委切实搞好党风。全会认为，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全党自上而下地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健全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对于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实现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变，保证四个现代化的顺利进行，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

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规定了正确的纪律检查工作的路线和政策。新中国刚成立，党中央在1949年11月就发布了关于建立中央和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都对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纪律检查机构，作出了重要决议。虽然在实际工作中这些决定和决议没有得到完全的贯彻执行，党对纪律检查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支持不够，但是各级纪律检查机关，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对广大党员进行了遵纪守法的教育，检查处理了一些党组织和党员违法乱纪的案件，支持和保护了一批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好同志，清除了少数混进党内的阶级敌对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

在我们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后，由于地位和环境的变化，一些党员干部居功骄傲、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有所滋长。党的民主集中制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破坏，这种破坏在1958年特别是1959年以后逐步发展，以致在一段时期内，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受到干扰，党员不敢如实反映情况，不敢提不同意见，不敢主持公道，不敢对党组织和领导干部提出批评，党员甚至党委委员的民主权利受到很大的损害。一些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纪的现象不能及时制止，一些冤错案件不能及时改正。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着重纠正了这种现象，毛泽东同志在会上的讲话也着重讲了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重大意义，但是由于没有规定保证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的具体制度和办法，这次会议的号召并没有长久生效。而且不但如此，由于林彪等人大规模地宣传个人迷信，党中央的集体领导比以前更加削弱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完全摧毁了党的各级机构和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这帮穷凶极恶的反革命践踏党内的生活的一切准则，拉帮结派，重用坏人，打击好人，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使党的纪律废弛，不正之风猖獗，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派性横行，践踏党纪国法的现象不能制止，大量积案，大批受害的同志长期申诉无门，沉冤不得昭雪。我们党的事业遭到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只要我们党削弱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纪律检查工作，必然会窒息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破坏党规党法和社会主义法制，不仅不可能顺利建设社会主义，而且，会给林彪、“四有帮”那样的野心家、阴谋家以可乘之机，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实现反革命复辟大开方便之门。这个极其沉痛的历史教训，全党同志必须永远记取。

（三）

根据党的历史经验，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必须遵循以下各项重要原则。

一、严格区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我们必须严格地实行这个原则，不能把它仅仅挂在口头上。党内矛盾，大量的是属于人民内部问题，对于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一定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正确区分工作中的一般性错误和政治性错误的界限，区分一般性政治性错误和路线错误的界限，特别是要严格划分党内错误和反革命活动的界限，决不容许混淆这些界限。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一时分不清楚的，先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严禁那种先打倒、后审查，先定性质、后凑材料的违法行为。严禁把专政矛头指向党内，用对敌人的手段来对待党内同志。

二、反倾向斗争，必须从实际出发。

如果党内出现错误的政治倾向，应该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有多少反多少。哪里发生了问题，应该尽可能就在哪里解决。当前，要特别注意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防止和克服“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错误倾向。反倾向斗争是严肃的思想工作，应该有领导、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不能采取急风暴雨式的、压服式的方法。要坚持延安整风（不

包括所谓“抢救运动”)的优良传统,摆事实,讲道理,和风细雨,以理服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要加强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错误的性质和轻重的判断要恰如其分,防止无限上纲,特别要防止随便说什么路线错误,随便说什么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要真正做到及时解决问题,反对等到问题成堆后算总账。

三、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

逼供信是法西斯式的反动统治阶级办案取证的一种野蛮手段,林彪、“四人帮”一伙把这种反动做法发展到极其骇人听闻的程度,严重地破坏了党规党法和社会主义法制,败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发展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歪风,造成了大批冤案、错案、假案,使党和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今后必须坚决地永远地禁止这种非法的做法。审查处理案件必须认真调查情况,听取不同意见,反复核实材料,在取得确凿证据的基础上,按照党的一贯政策,做到定性准确,结论恰当,处理正确。不能轻信口供,不准诱供、指供、逼供,不准施加体罚和变相体罚。审查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和保留意见。允许别人给他申辩。

需要立案审查和处理的党内问题,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按照我党历来的规矩,由纪律检查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办理,不得另立其他审查机构。

四、对人的处理要持十分慎重态度。

要坚持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有错误一定要揭发批评,不能含糊敷衍,同时要对犯错误的同志作全面的、历史的、客观的分析,不能只看一时一事的错误而否定一切。对于在错误路线影响下犯错误的同志,应多帮助他们分析错误的原因,指出改正办法,要他们真正了解自己的错误以及错误的性质,不着重追究个人的责任。要慎重对待那些党性好、能力强、干劲大,但又犯了某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错误,鼓励他们大胆工作。对于所有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不是屡教不改的,处理时应取宽大方针。可处分可不处分的就不处分,可轻可重的就从轻处分。凡涉及定敌我矛盾、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逮捕法办的,更要慎之又慎,严格遵守党纪国法规定的程序。定为敌我矛盾的,也要实行“给出路”的政策。不论被审查、受处理的人问题多大,决不能株连其无辜的家属和亲友。

五、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

冤案、错案、假案一经发现,就要坚决纠正。一切不实之词,一切不正确的结论,一切错误的处理,不论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作出的,不论是哪一级组织、哪个领导人批准的,都要纠正过来。全错的全平,部分错的部分平,不错的不平。有错必纠是一条原则,有错的不纠是没有党性的表现。对确实没有判错的正确的结论,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和不尊重客观事实只凭“长官意志”办事,为了维护个人尊严而知错不改,都是严重的错误,都必须坚决纠正。

六、敢于斗争,刚直不阿。

所有担任纪律检查工作的干部,都应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既要坚持原则,又要谦虚谨慎,时刻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不怕压力,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要刚直不阿,不徇私情。既要勇于保护好人好事,又要敢于同任何违法乱纪的组织和个人作不调和的斗争。要严格按照党的章程办事,模范地遵守党纪国法。凡是怕字当头、回避矛盾、屈从压力、阿谀逢迎、不能坚持原则的人,不能做党的纪律检查工作。

七、认真走群众路线。

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干部,要同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了解他们的愿望和呼声,掌握党员遵守党规党法的情况。坚决反对那种办事拖拉、不负责任、脱离群众的衙门习气和官僚作风。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要多从群众中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防止偏听偏信。既要听揭发人的意见,也要听被揭发人的意见,还要听有关同志的意见。不应当一听到被揭发人申辩,就说人家态度不好,扣上“翻案”的帽子(翻案本身不能说是对或不对,要看翻得是否在理);不应当一听到有人替犯错误的同志说话,就说人家立场有问题。

八、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由集体讨论决定,依靠大家的智慧和经验,把事情办好。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都有正常的民主生活,这是集中集体智慧的方法,是避免和减少工作上犯错误的方法。需要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的重要问题,都要经过集体讨论研究。要提倡讲老实话,讲心里话。委员会成员和所有干部都要勇挑重担,大胆负责,谨慎细致,真正把自己承担的工作做好。

(四)

当前,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要紧密围绕搞好党风这个中心,抓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协助各级党委,对党员加强党的纪律和党的传统优良作风的教育。我们党现在有3600多万名党员,近半数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入党的,许多同志没有经受过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的严格训练,不大懂得党规党法。不少“文化大革命”前入党的同志,甚至有一些领导干部,也对坚持党的好传统、好作风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不严格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淡薄了,甚至丧失了。不少同志在思想上作风上受林彪、“四人帮”的毒害很深,有些人甚至丧失党性,蜕化变质。这种情况,迫切要求我们在全党特别是在新党员中加强党的纪律和党的作风的教

育。要使每个党员懂得：必须坚守“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发扬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的优良传统；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遵守“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统一纪律；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不能利用职权要私情，谋私利。对那些模范地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模范地遵守党纪国法的党员和干部，要及时表扬和鼓励。

第二，抓紧处理积压的案件。首先要与党的组织部门、公检法机关密切配合，抓紧做好冤案、错案、假案的平反和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要及时检查处理：在党内搞阴谋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的案件，肆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案件，破坏党规党法和社会主义法制、侵犯党员民主权利的案件，破坏财经纪律和国家统一计划的案件，由于弄虚作假、骗取荣誉的案件，由官僚主义而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案件。凡是有广泛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件，要通报全党，以至在报上公布。这一方面是伸张正气，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另一方面必然会激发广大党员与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安定团结，有利于引导群众心情舒畅地为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第三，认真做好来信来访工作。对群众的揭发、申诉和控告，要认真处理。现在积案很多，为了及时处理，必须采取分级、分部门处理的办法。不能把可以和应该由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或其他部门处理的案件，都集中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这样就会延误处理案件的时间。重要的来信来访，各级纪委领导人要亲自过问。对上访者要热情接待，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要弄清情况，妥善解决。一方面要保护控告人。另一方面对打击报复或蓄意诬告好人的，要按党纪国法制裁。

第四，尽快建立和健全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县、团以上各级党委没有建立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要尽快建立；已经建立的，要抓紧开展工作。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员，应选党性强，作风好，有威望的同志担任。办事机构要精干有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发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好传统，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发展了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开展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第一次全会，号召全党从事纪律检查工作的同志，解放思想，开动机器，既要坚持党的原则，以大无畏的精神去克服各种困难，又要保持谦虚谨慎、冷静客观、兢兢业业的态度，力戒骄傲自满、主观武断、粗枝大叶的作风。要同全党同志一道，振奋革命精神，努力做好工作，为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我们的党，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伟大强国，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完整地 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随着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显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紧迫了。可是，我们一些同志至今对这个问题还缺乏正确的认识。有的说，现在把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说成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是不是估计太高了？还有的同志提出：既然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么，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现在还适用不适用？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政策，按照变化了的情况实事求是地修订政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坚持的原则。为了回答一些同志提出的问题，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很有必要对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作一番历史的考察。

（一）

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在全国解放以后提出来的。在这之前，我们党对已经参加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也提出了教育和改造的任务，但是因为当时参加革命队伍的知识分子还很少，所以我们党对广大知识分子，还是着重强调“大量吸收”。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错误路线的影响，我们许多地方和军队的同志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革命队伍内部知识分子很少很少。抗日战争初期，一批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但是，当时我们的许多同志还没有认识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在着疑惧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不注意吸收知识分子的工作。针对这种倾向，毛泽东同志在1939年为党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个决定在各个根据地的实施，吸引和吸收了大量知识分子参加我们的革命队伍，壮大了革命力量，发展了革命的统一战线，推进了根据地各方面的工作。通过在革命队伍中的锻炼和改造，很多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融合一起，发展壮大了我们党的干部队伍，这是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接收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大量的宣传、教育机构、各类学校和各种文化、文艺团体，以及各种经济企业事业单位。这里面大约有二三百万名知识分子，包

括教员、教授、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新闻记者、医生和其他知识分子。对这些知识分子应当采取什么政策？是赶走、抛弃他们，还是争取、团结他们？党中央认为，不应该赶走、抛弃他们，而应该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使他们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服务。这样做，是革命的需要，是出于好意，是为了防止发生抛弃他们的错误倾向，是为了使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逐步转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是根据当时我国知识分子的实际状况而制定的，是建立在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大多数知识分子也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感觉到痛苦，具有革命性。死心塌地为反动派服务的反动知识分子，只是极少数。为旧社会服务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也是脑力劳动者，其中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受到资本家的剥削。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他们可以接受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新中国的成立，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变，为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转到为社会主义服务，创造了根本的条件。

但是，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还没有和共产党相处过，对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对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对人民政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方法，都还很不了解，很不熟悉，在他们的头脑里，主要还是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他们中的大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接受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影响，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要使他们适应新中国的需要，为社会主义服务，就必须对他们进行教育，帮助他们重新学习，逐步地把世界观改造过来。

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它的主要对象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这些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时期一定阶段的一个特定的历史任务。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随着这些知识分子的变化以及我国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状况的变化，我们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应该做相应的改变。

（二）

现在，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全国解放 20 多年来，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发生了哪些变化？

我国现有 2500 万名左右知识分子，大体上是由三部分人组成的：一部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一部分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已经知识化了的工农干部；绝大部分（这一部分占 90% 以上）是我们党在新社会培养的中年青年知识分子。在后两部分人中，绝大多数本来就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至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已经逐步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先看来自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所发生的变化。世界观的根本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这些知识分子，已经由过去的为旧社会、为私有制服务，转到为新社会、为公有制服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机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不少人已经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存在决定意识。他们在解放初期为新社会服务还不自觉或不太自觉，但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对他们思想的影响，已经使他们逐渐变得自觉起来。他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在同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他们已经不是解放初期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不甚了了的知识分子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满腔热情地从事科技、经济、教育、文化、文艺、卫生工作以及其他工作，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和严重摧残下，也没有动摇对党的信任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决心。他们的这种变化和进步，正是党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伟大胜利。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迸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衷心拥护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更加奋发努力地工作。这样的知识分子，难道不是工人阶级自己的而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吗？

在团结、教育、改造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同时，我们党用了很大力量培养了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包括“文化大革命”中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其基本特点是：他们中间的 70% 以上出身于劳动人民和革命干部的家庭；他们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教育；他们一开始参加工作，就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他们是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通过学习，通过社会斗争的实践和业务实践，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包括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许多知识分子，已经基本上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他们年富力强，已经成为科技、文教、卫生、文艺等战线的骨干力量。他们当然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我们的工农干部，经过多年的学习和实践，其中不少人读了工农速成中学，有些人还读了大学或到外国学习过。他们已经从缺少知识变为有知识了，或者是知识比较丰富了，相当一部分人已成了各行各业的专家。这些知识化了的工农干部，当然也是工人阶级的

知识分子。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解放20多年来，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根本的变化。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观念形态要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而变化的原理，我们党在解放初期提出来的，以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现在对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已经不适用了。他们已经不是解放初期那种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而是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人阶级，是党的依靠力量。正确对待他们，在今天实质上是一个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内部关系的问题，而不再是处理工人阶级和同盟者关系的问题了。在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工人阶级内部，巩固地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关系，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之一。

（三）

既然如此，为什么有些同志还看不到、不承认或者不敢承认这些变化呢？

首先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没有肃清。林彪、“四人帮”在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的同时，用心险恶地炮制了一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在工人阶级内部制造分裂，把杰出的各方面的专家和作家诬蔑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把解放后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诬蔑为“挖社会主义墙脚”的势力。他们把有没有知识和知识的多少，作为判断一个人的阶级属性的依据，把有知识的人，说成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进而把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按照他们的这个逻辑，不仅从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不能转变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而且工农干部和工人、农民及其子女有了知识，也就成了资产阶级。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林彪、“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他们散布的这些反动谬论，还在影响着我们的一些同志，使这些同志不仅看不到知识分子的进步，而且对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偏见和厌恶心理。他们对知识分子唯恐避而不远，生怕沾了知识分子的边被说成阶级路线不清。他们总是把知识分子同所谓“政治不可靠”、“思想落后”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工人阶级似乎不应该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其实，就是在旧社会，工人阶级早就有了自己的知识分子。难道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不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吗？19世纪末，恩格斯就指出，正在出现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希望他们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恩格斯在19世纪末提出的希望，在我国已经成为现实。

10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实行法西斯专政，也把人们的思想搞僵化了。我们一些同志的条条框框很多，书上、文件上没有写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他们既不考察“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怎样提出来的。又不研究知识分子队伍状况的变化，还是用老眼光看问题，按老框框办事。他们不懂得，如果从实际出发，我们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早就应该变了。陈毅同志在1962年的一次报告中说得好：“如果说一个科学队伍12年还不能改变，说明共产党没有本领，社会主义不能代表真理，对工作作了过低的估计。人是可以变的，也是能服从真理的。”从1962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又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严峻的锻炼和考验，难道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变吗？难道我们还没有培养出大批新的知识分子吗？难道我们还应该按照解放初期提出来的、主要是针对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政策来对待他们吗？

思想不解放，还由于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和100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给我国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停滞状态，也在人们头脑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因循守旧，安于现状，目光短浅，不求进步，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就是这种习惯势力的表现。受这种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我们有些同志不注意学习，长期以“大老粗”自居，以没有知识为光荣，对有知识的人瞧不起。有的人私心作怪，生怕依靠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使自己失去高人一头的优越感，自己的“长官意志”遭到损害，因而轻视甚至排斥知识分子。这种错误思想和错误态度如不纠正，就会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阻力。要懂得，搞革命，没有知识和知识分子不行；搞建设，特别是搞现代化建设，没有知识和知识分子更不行。为了加速现代化建设，我们需要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这就不仅要充分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积极作用，而且要大力培养和造就更多的知识分子。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理论、学科学、学技术、学管理，努力成为精通本行的专家。

我们肯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并不等于说，知识分子今后就不要教育和改造了。毛泽东同志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都明确指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人人都需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